

周俊宇談 「我的留日奮鬥記」

撰文／林亨芬（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）

博士領航工作坊於 10 月 17 日，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周俊宇助理教授，分享留學日本與求職甘苦。周俊宇大學就讀政大中文系，輔修歷史系與日文系，碩士班時期轉攻政大台史所。後來到東京大學博雅學院區域文化研究所（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）深造，取得博士學位，他主要的研究領域為日治與戰後台灣史。周俊宇回首自己留日生涯，將其劃分為四個時期：2010-2015 年之摸索體驗、2015-2020 年之育兒與苦惱、2017-2020 年的轉折、2020-2021 年從畢業到返鄉。本次演講將逐一訴說他的求學心路歷程，並以此為軸介紹日本學術環境的特色。

摸索和體驗日本學術文化

2010 年周俊宇以外籍研究學生（外國人研究生）身分進入東京大學，隔年考取正式生（院生）資格。開學前發生日本





311 大地震，親友曾考量安危勸其放棄學業返台，惟當時的自己就要開始實現夢想，無法說走就走。周老師開玩笑說道，那時放棄的話，也就不一定有機會在此與跟大家分享。

東大駒場校區前身是舊制第一高等學校，戰後改制成為東大博雅學院（教養学部），該學院的制度設計就是大一大二不分系，目的在實施通才教育。大三以後則依成績、志願等條件可選擇轉至本鄉校區的法學院、文學院、理學院等，或是留在駒場校區繼續完成博雅學院的學業。其研究部（總合文化研究科）的學術定位亦在於文理融合。因此，東大博雅學院授有非單一專業領域，而是具有科際整合意涵的「學術」（philosophy）博士學位。

留日期間的校園生活，周俊宇以自身指導老師川島真教授研究班為主要學習場域。川島研究班在東大駒場的國際化程度高，除日本學生外，留學生以中國人最多、台灣人次之，偶有歐美學生。正課以外，每週二中午有同門師生研究會，安排學生報告、討論，並由老師指導講評。老師經常追問「問題意識」，不斷刺激他們進行多面向的思考。



在日本，名為「懇親會」等的飲酒聚會是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，學術社群也藉此暢談交流的場合，川島研究班常有這類飲酒聚會。有位日本友人曾觀察道：「在台灣是變成朋友後，才去吃飯喝酒；日本則是為了變成朋友，而去吃飯喝酒。」周俊宇覺得有幾分道理。他自承留日前並非擅於交際的性格，去到日本後反而因研究室的環境，拓展許多學術的交流能力和人際關係。除了從接待外賓、擔任口譯等協助台日交流事務中獲得歷練外，更因而結識了許多來自台灣的師長、學友，遠勝過赴日前的自己。

除了上述師生間定期的研討會、課餘聚會，達到訓導與勉勵作用外，他們亦會離開學校移地研習（合宿）。白天開討論會，晚間則飲酒歡談，自己也能藉機安排旅行，去日本各地走走，周俊宇就實際造訪過新潟、靜岡、廣島、京都、北海道等地。

周俊宇指出，日本學界的發表機制以「學會」為主流，許多發展成熟的學術領域皆有學會，絕大多數學會採會員制、每年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，公開徵稿、公正審查，無論是發表或聽講都要收費，晚間的餐會只要是會員皆可付費自由參加，是結識研究室以外學界師長、學友的重要場合。日本學界不像台灣有人文學核心期刊（THCI）、社會科學核心期刊（TSSCI）等期刊索引制度，學會期刊經常才是重要業績指標。在學會上的口頭發表，將有助於日後投稿該學會期刊，所以指導老師會強烈建議學生加入與研究領域相關的學會、積極爭取發表與投稿的機會。在日本學界，博士論文只是階段性成果，許多新科博士會花二至三年，將博論各章發表於期刊且整理出書，作為求職的敲門磚。

在日本做「博士後」

周俊宇形容留日期間大約十年，前五年處處驚奇，後五年自我懷疑。2015年他升格為父，出現多重身分的期待與落差，雖有初為人父之喜，並領有獎助減緩經濟壓力，但面對茫然未知的攻讀學位之路，也對人生產生自我認同的嚴重焦慮。所幸在2017年申請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（PD）的博士後獎助，而有了些許轉折、緩解。

由於此一研究員獎助項目要求錄取後不能保有學籍，因此他運用日本獨特的修畢學分離校（滿期退學）制度，離開東大轉至早稻田大學從事研究。他介紹此制度需找有別於母校的掛單機構，錄取後對研究業績無硬性要求，且能申請額外的計畫補助經費。原本的制度設計精神有如台灣的國科會博士後研究人員，是針對取得學位的優秀博士，提供期限三年的過渡性獎助，以持續研究。周俊宇申請時，這個制度也接受攻讀學位較理科耗時的文科博士，能以「修畢學分離校」的身分申請，這對他安心完成後續的博士論文研究益助良多。

2018-2020年間，周俊宇除研究之外，也到東京醫科齒科大學、獨協大學兼課講授華語，在研究、教學、家庭等蠟燭多頭燒的情形下，臨近修業年限關頭，竟發現自己罹患了癌症。這令他得面對選擇「課程博士」或「論文博士」的關卡，所謂「課程博士」即一般認知的博士學位，滿足在年限內修完畢業學分、提交論文通過口試等條件，便能取得學位。「論文博士」則是日本的特殊制度，單以論文送審便可申請博士學位，雖少了修業年限和學分等條件，但在論文品質的要求上可能比「課程博士」還要嚴格。

早期日本的大學教師未必有博士學位，有些教師在任教期間可循此管道取得博士學位。這二種博士學位的「含金量」並無甚差別，但當時周俊宇評估只差臨門一腳便能在年限內取得一般學位，因此他得知癌症能夠治癒後，便提起

意志，在師長、友人協助下，於最後兩個月突破種種難關，趕上年限內提交論文。他表示自己在提交論文後，隔天便入院治療，療程結束後隔週，便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以遠距方式進行口試，終於完成長年在日本的學業。

畢業後，周俊宇在日本學術振興會的博士後研究員的任期已經結束，他除繼續掛單於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擔任特約研究員，繼續執行研究計畫外；隨後也在川島老師的引薦下，加入東京大學尖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團隊，擔任專案研究員。任職期間他原先朝期許自己努力把博論各章改寫成論文投稿，並集結成專書出版的方向努力；不過同年台灣有不少大學職缺的應徵機會。周俊宇自我檢視因喜愛台灣而做台灣史研究，比起在日本「行銷」台灣，更想回國參與「打造」台灣，也就花了不少心力在返台求職上。結果很幸運地能夠回到母校工作，開始重新的適應與全新的挑戰。

周俊宇回顧在日奮鬥的過程，就是包括求學、人父、住院治療在內的各種人生解鎖。博士班的歷練內容不只是學識涵養，還包括人生各種關卡的抗壓性。他的指導教授經常給學生的求職箴言是：「實力是基本，運氣不可求，緣分靠自己」。周俊宇自我期許未來能以腳踏實地的態度，在學術之路上前進。

連結台灣、日本的學術經驗

周俊宇精彩的學思歷程分享，令與會者就諸多議題，進行熱烈的提問與交流。一位聽眾對於老師的大學經歷提問：「大學主修中文系對於日後工作的幫助是什麼？」周俊宇說，大學選擇中文系，就讀後雖感覺自己志不在此，但並未轉系，這對於日後轉換跑道，成為歷史研究者其實也很關鍵。因為他是在系上陳芳明老師的台灣文學史課程受到莫大的啟發，才想要深入鑽研台灣史，並決定修習歷史與日文輔系。在自己預計畢業那年，也幸運碰上政大台史所碩士班第一屆招生，得以報考入讀。

還有聽眾針對日本與台灣學界的研究關懷和資源異同提問：「在研究取徑上，日本與台灣很不一樣，如何思考來找到平衡點？另外，日本學術振興會對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有什麼申請條件？」周俊宇說，他的博士論文討論日本人的台灣人觀，在問題意識上雖由日本帝國殖民史出發，但也設計成可與日治台灣史對話的議題，意即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，處在什麼樣的困境？形成對台日雙方的學界都能夠對話的平衡。至於學振的外國人研究員，則要透過日本的接待學者、教研機關提出申請，所以申請前必須先取得日本老師的同意。語言方面則似乎未必要精通日語，也有使用英語即可的案例。

關於職場工作規劃，聽眾想進一步了解：「回台後如何克服適應台日學術環境差異？」周俊宇坦言，首先要克服兩地對研究業績認定的不同：有些日本學者可能一生深耕某一研究課題，持續提出新的解釋然後出版厚實鉅著；台灣就比較重視投稿期刊的等級與數量，兼有撰寫專書的部分。原先自己的指導教授是期待他改寫博論成專書，在日本出版；但回台任教了解升等規定後，決定轉以新的研究主題為優先。綜合考量之下，他調整策略為翻譯、修改博論章節投稿台灣一、二級核心期刊，這部分未來雖然無法算作升等著作，仍可作為學校評鑑、申請補助的指標，兼向國內介紹自己的博論研究成果。

周俊宇至今已累積十餘本譯著，也引發與會者好奇：「老師翻譯著作的因緣與收穫是什麼？」他表示，之所以會接觸翻譯，最早是碩士班時期師長邀請加入翻譯計畫，後來自己受到出版社注意，而有了持續的邀約。雖然翻譯對自身的研究主題未必有直接幫助，不過他回憶，當時在寫博論的低潮期中，翻譯反而為他提供一些即時的成就感，同時也能深入掌握日本的研究成果，並磨練文筆表達能力。他由此反思，或許翻譯活動間接地為自己的學術經歷加了分。最後，他鼓勵本次與會博士領航工作坊的年輕學者，在學術之路上可以多加拓展自己的嘗試範圍。 ■